

中国戏曲志·广东卷

(一)

综述·图表·剧种

《中国戏曲志·广东卷》编辑委员会

一九八七年九月

综 述

广东戏曲的渊源

广东省，古为百粤之地。秦始皇三十三年（公元前214）置南海，徙中县军民与百粤杂处。秦末，赵佗自立南越国。汉高祖十一年（公元前196）立佗为南粤王，佗称臣。元鼎六年（公元前111）置南海、珠崖、儋耳等郡。三国时吴国黄武五年（224）分合浦以北为广州。唐称岭南道，五代自立为南汉国。宋为广南东路，简称广东，广东之名自此始。元为广东道。明置广东布政司，分岭南、岭东、岭西、海南、海北五道。清代设广东省。民国设广东省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，设广东省，省会广州市。

历代以来，广东有州县外隶，唐开元时，潮州曾隶福建；元代，广、惠、韶、潮、南雄府属江西行省；肇庆、德庆二路，封、连二州曾隶广西，属湖广行省。

广东省位于南岭之南，东邻福建，西接广西，北靠江西、湖南，南临南海，海岸线六千多公里。境内东有韩江、潮汕平原，中有珠江，珠江三角洲地带，均广袤千里，河网纵横。西南是我国第二大岛海南岛，土地肥沃，资源丰富。广东气候温和，雨量充沛，三冬无雪，四季常花。稻薯三熟，蚕丝七收。有优越的自然条件，物产丰富。

广东古代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。秦时开始戍兵。南北朝时期，北

方战乱，汉族人民南移者众。唐、宋为屯兵之地，逐渐成为多民族杂居的地方。《丘文庄公集》载：“魏晋以来，中原多故，衣冠之族，或官或商，纷纷南来。聚庐托处。薰染进化。岁异而月不同，世变风移，久假而客反为主。”现今有汉、黎、苗、瑶、壮、回、满、畲等民族。沿海有水上居民，称为疍家。多民族共同奋斗，创造和发展了广东的经济文化。

广东自古内外贸易发达。东汉时，番禺“充斥于扬越”；西晋初年，有阿拉伯商人居留广州，从事贸易；唐代，广州设市舶司，专事内外贸易。经济繁荣，宦官在任，常致巨富，故有“广州刺史，经城门一过，便得三千万”之说（梁·萧子显《南齐书·王琨传》）。宋代以后，经济贸易进一步发展，来广州贸易商船“大者二十余丈，高去水二、三丈，望之如阁道，载六、七百人，物出万斛。”（宋时《太平御览》）成为全国贸易枢纽，刘克庄《广州即事》诗咏：“东庙小儿队，南风大贾舟，不知今广市，何似古扬州。”商船还远涉海南岛贸易，宋·李光《阜通阁》说：“千帆不隔云中村，万货来从海外舟”。粤北为南北交通要冲，贸易运输频繁；宋代余靖曾于韶州开矿铸钱。潮州经济也很富庶，杨万里诗赞其“如今风物冠南方”。

随着经济发展，南北文化交流日多。中原多种文艺不断传入，民间娱乐及祭祀歌舞盛行，官宦之家蓄养伶工。南北朝时期，北方艺人来粤“更唱迭和，曲有余态。”唐开元时，李仙鹤擅演参军戏，“封

为韶州同政参军，以食其禄”。唐代南海郡太守，蓄有家班“散乐”。南汉光天二年（943），广州等地“盛饰声伎”、“作乐酣饮”。宋代“开宝中平岭表，择广州内臣之聪警者，得八十人，令于教坊习乐艺，赐名萧韶部，雍熙初改曰云韶部。”连州陈用休著有琴书十卷。

广东是多方言地区，各方言区的民间娱乐形式源远流长。操粤语方言的粤中，俗喜游乐，歌谣古已有之。广州普基出土碑刻歌谣道：“永嘉世，九州荒，余广州，平且康。”民间流行粤讴，木鱼歌等说唱。张买于“孝惠帝时，侍游苑池，鼓擿能为越讴。”（《百粤先贤志》）明初，孙贲被捕入狱，也“望部门讴吟越声”。百姓好唱木鱼歌，王士禛《竹枝词》谓：“两岸画栏红照水，画船争唱木鱼歌”。歌词可长可短。“长调者如唐《连昌宫词》、《琵琶行》等，至数百言、千言，以三弦合之。……其短调踏歌者，不用弦索，往往引连物类，屈曲譬喻，多如《子夜》、《竹枝》。”（《广东新语·粤歌》）至于斋醮祈禳，张灯演戏，更为常见。《广州府志》记述唐宋以来城北将军庙“岁为神会，作鱼龙百戏。共相睹戏。萧鼓管弦之声达昼夜，其相沿由来旧矣。”粤北韶州、南雄府，岭东惠州府及梅县、兴宁等地，是客家方言区，山歌、竹板歌很为流行。前人有“渔人与樵子，唱彻百蛮天”之赞语。唐元和年间，刘禹锡在连州作《插田歌》，记述农民劳动时唱歌的情景：“齐唱田中歌，嚶吟如‘竹枝’”。唐·皇甫松《竹枝词》：“槟榔花发鹧鸪肥，雄飞烟瘴雌也飞。木棉花尽

荔枝垂，千花万花待郎归。”颇类客家山歌。粤东地区、海南岛、雷州半岛所用方言，同属闽南语系，风习大同小异。民间流行“歌册”，妇女尤为喜爱；俗喜奏弦琴笛管，乐声传扬乡村街巷；民间迷信尚鬼，祭祀常年不断。《潮州府志》记：“九邑皆事迎神赛会……银花火树，舞榭歌台，鱼龙曼衍之戏，蹈踏鞞之技，靡不毕具”。海南岛新春节期，“装僧道、狮鹤、鲍老等剧，又装番鬼舞象，编竹为格，衣布为皮，或皂或白，腹间贮人，以代行舞。”（《正德琼台志》）宋代，相传潮州盛行木偶、皮影。元代，海南已有手托木头班之演唱，来自潮州。

诸多民间娱乐活动，为广东戏曲的形成准备了良好的基础。

广东戏曲的形成

明洪武元年（1368）二月，兵分二路入粤，一路海道取潮州，四月取广州；一路由赣州经南雄、韶州克德庆。七月，海南，海北皆降于明，至此，广东全省统一于朱明政权之下。

洪武时来广东的兵士乃永嘉侯朱亮祖旧属，多为两浙人。取海道者，经闽又添福建兵马；取陆路者，兵多赣州兵。故广东屯兵，以闽浙赣人为多。《碣石卫志·民俗·卷五》载：“洪武年间，卫所戍兵军曹万有余人，均籍皖赣。……戍兵散荡饮喝……聚赌博奕，而肇殴斗吵打之祸，卫所军曹总兵有见及此，乃先后数抵弋阳、泉州、温州

等地，聘来正音戏班”。籍演戏以慰思乡之情、行薰陶之事。碣石卫辖海丰、陆丰、惠来、惠东防务，碣石卫城、捷胜所城和海丰城隍庙皆建有古戏台，海丰城隍庙戏台有石碑记载“洪武二十八年建”。黄绅《石桥场新筑土城记》谓碣石“国初以来”，“歌舞相闻”。

洪武三年（1370），缮广东边海城堡，四年二月，工部遣官往广东卖牛给中原屯种。自是，广东经济有较大的发展。

广州是重要的对外贸易城市，“广州富庶天下闻”，有“金山珠海，天子南库”之称。全国各主要行省皆来贸易，商贾来往繁多，据知明代有十八个行省在广州建立会馆。南宋以来，温、台、漳、泉、潮、琼各州和广州之间，海上船运交往频繁。苏东坡谓海南“北船不到米如珠，醉饱萧条半月无”，“广泉海舶绝不至，药物酱酢等皆无”。粤北古道有南雄通赣南、乐昌通郴州、连县通邵阳三条；另有内河由广州溯西江而上，经广西苍梧、桂林抵湖南。广州成为内外贸易中心后，内地各省有茶、丝、土布、瓷器及土特产南运出口；广东又有食盐、日用品等北运湘赣。戏曲经海、陆两路随官宦、军旅、客商及挑夫播流入粤。

南戏由海道经闽南传入粤东和海南岛。洪武二十八年（1395），粤东碣石卫城、捷胜所城及海丰城隍庙，建有固定石戏台，演戏酬神娱人，年无虚日，成为当地“大棚脚”。明宣德六——七年（1431——1432）写本《忠孝正字刘希必金钗记》（即《刘文龙菱花镜》）

和明嘉靖年间（1522—1566）写本《蔡伯喈》（即《琵琶记》）。在潮州、揭阳出土，两个写本皆是宋元南戏，有艺人演唱点板符号和锣鼓谱，杂有方言，是南戏艺人演出手抄本，中原音韵和洪武正韵并用，其中也有入声韵。

海南人丘浚（1420—1495），祖籍泉州，官居入籍琼州，乡试在潮州得中，明景泰五年（1454）进士，官至太子太保，兼文渊阁英武殿大学士，喜戏曲，撰写《五伦全备记》、《投笔记》等五种传奇，按南戏曲牌填词，相传海南艺伎曾以琼州方言在青楼演唱《投笔记》。

广州随着商业、贸易的繁荣，娱乐交际的需要，歌舞管弦随之汇集，戏曲也传播植根。城南濠水畔，“朱楼画栋，连绵不断，女旦美者鳞次而居”。明洪武四年（1371）任工部织布局使的顺德人孙贲《广州歌》谓“闽姬越女颜如花，蛮歌野曲声咿哑”。

广东民间好戏成风，官绅屡申严禁。成化十五至廿二年（1479—1486）、新会知县丁积通谕：“子弟多不守常业，惟事戏剧度日”，责令“用鼓吹杂剧送殓者，罪之”。成化十七年（1481），佛山石湾太原霍氏族谱记述“七月之演戏，良家子弟学习其事，虽学会唱曲，与人观看，便是小辈之流，失于大体；一入散诞，必淫荡其性。”弘治元年（1488），顺德县知县吴廷举禁淫文中有“唱戏舞像，男女杂沓”之说。弘治年间兴宁县令祝允明主修的《兴宁县志》

记载有“南杂剧演出”；正德十六年（1521），提刑按察司副使魏校“谕民文”曰：“倡优隶卒之家，子弟不许妄送社学”、“不许造唱淫曲，搬演历代帝王，讹谤古今，违者拿问”；责令南雄属各州县，“不许贩卖曲本，诲人以淫”。揭阳薛侃立《乡约》：“家中又不得搬演乡谭杂戏，荡情败俗，莫此为甚，俱宜痛革”。潮州薛清暨定《家诫》：“俳优之事，侏儒短人之属，皆非家所有也”。官宦豪门虽严令动禁，但城镇乡坊演戏蔚然成风，相沿在俗，甚至孤悬海外的琼州府，演戏之风亦盛，且有教戏之习。《正德琼台志》记叙海南春月“武弁竞办杂剧故事”，“卫所演游会之戏”；端阳南湖游宴，“以数艇相夹，演戏于上”。军弁所为，庶民仿效。“下则酒色教戏，海淫赌博丧家”。其它各地俗尚戏剧的记载，比比皆是。嘉靖十四年（1535）《广东通志稿·风俗》及嘉靖三十七年（1558）刻本《广东通志·风俗》记叙广州府“二月城市中多演戏为乐，谚云：正灯二戏”；“广州南濠杨宅……屡演戏以娱鬼”。潮州府“潮俗多以乡音搬演戏文”；“习尚大都奢僭，务为美观，好为淫戏女乐”；“仲春祭四代祖，是日坊乡多演戏为乐”；“潮阳……士大夫重女戏”。韶州府、惠州府、雷州府“妆饰杂剧”，“搬办杂戏”，“妆鬼搬戏”；在粤北山区连山，“江浙戏子至，必自谓村野，辄谢绝之，近日一切仍是。”并形成“搬戏难成器，弹弦不是贤”的谚语。

成化至嘉靖末年（约1465——1566），入粤的外来声腔

剧种繁衍发展，出现本土戏班，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声腔。嘉靖《碣石卫志·民俗》（乾隆卅年乙酉重印本）载：“吾邑之戏有二焉，一曰白字戏，亦名梨园，多童伶，戏多文少武，唱乡音，闻白字戏昔随闽南人入籍本邑而来，宋元已有之。一曰正音戏，讲官话，文武并演，俗名大戏”。正音戏植根于粤东，使用带当地土音的官话（又称戏棚官话），所用声腔为大板曲（兼有弋阳腔、青阳腔、四平腔等）。剧目有《琵琶记》、《白兔记》、《荆钗记》、《三元记》、《月华记》、《满床笏》等。正字戏从唱乡音的白字戏输入艺员，又授艺于白字戏伶童，二者过从甚密。“世宗以来，邑人自白字戏伶童年稍长者，多到正音戏班学戏，其数逐年增多，可凑本邑正音戏班矣。”明万历五年（1577），碣石玄武山神台戏台建成。海丰、陆丰正字戏、白字戏经常演出。至此，正字戏在海丰扎根，成为地方剧种；白字戏也形成地方方言声腔剧种。

潮腔、潮调是南戏在潮州方言化的声腔。它沿用南戏音乐曲牌，但因语言变易引起腔调变异，形成独特的风格。嘉靖丙寅年（1566）至万历辛巳年（1581），用地方方言写成的《荔镜记》附《颜臣》、《新刻增补合像乡谈荔枝记》以及《摘锦潮调金花女大全》附《苏六娘》，三种共五个戏文刊刻流传。《乡谈荔枝记》标明“潮州东月李氏編集”，《荔镜记》卷末有“重刊荔镜戏文，计有一百五叶，因前本荔枝记字多差讹，曲文减少，今将潮泉二部增入颜臣、勾栏、诗词

北曲校正重刊……嘉靖丙寅”。《颜臣》是从南戏改为方言唱词的戏文，而《荔》、《金》、《苏》三剧皆系取潮州乡谈民间故事编成长篇传奇戏文。音乐曲牌大都来自南戏，兼有北曲。嘉靖戴璟谓为“乡音搬演戏文”，清初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，乾隆年间李调元《南越笔记》和清末《清稗类钞》皆谓之“土音唱南北曲者，曰潮州戏。”

外来声腔传入广东中部粤语地区，并在本地扎根。明徐渭《南词叙录》记弋阳腔“闽、广用之”。粤剧中保存的古老声腔，俗称“大腔”。与广东毗邻的福建、湖南，也有把弋阳腔（高腔）称为“大腔戏”或“大汉腔”者。明万历年间（约1573—1641）本地的广班、潮班的演出活动，已相当频繁。是时已有艺人在佛山创立琼花会馆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曾在佛山发现标志琼花会馆停泊戏船的码头的石碑，上刻“大明万历琼花水埗”字样。明万历《和平县志》载：“各圩场遇赛会，每雇江西班、广班、潮班诸剧，演戏庆祝”。广班、潮班一类的本地班社，已到广、潮之外的地区演出。清道光杨懋建《梦华琐簿》记：“广州佛山镇琼花会馆，为伶人报赛之所”。道光十年刻本《佛山街略》记：“东胜街，卖戏盔，有班馆，若戏船下乡不能承接，故设馆代之。琼花会馆，俱泊戏船。每逢天飢，各班集众酬愿，或三四班会同唱演，或七八班合演不等。极甚兴闹”。同治二年《高要县续修志稿》载：“出城西里许，临江有宅曰斋堂，塔脚后街亦然。……诘其创造何人，曰：佛山琼花会馆子弟醵金为之，每年

散班，游山玩水，与高僧往还，借此款洽。老年退班者到此养闲，诵佛忏悔，无他故也”。可见，广班已有相当发展规模。

明代嘉靖年间，由江西贬来琼州的关寿国（1522—1566），以扮演关王戏誉满琼州艺坛，撰杂剧《关王会》六折，后海南土戏曾改为方言演出。另有城上吴（原名不详，琼州府城吴姓者，1573—1620年）曾在琼州设馆教戏，并撰有《关王会》四折和《石碣大义灭亲》、《吴起杀妻》等。《吴》、《石》两剧相传用海南方言撰写，清光绪年间曾有木刻本。明代，闽、广等各地客商集资邀请闽、广戏班到琼演出。据《卢×外记》载：“白沙洋，西北一里有洗太夫人庙，左有天后庙，闽、浙、湖、广商船多集结于此。……奉祀娘后，有闽、广剧，神欣人乐，共乘六气。入清，隆盛尤更。”外地剧种入琼，促进了海南地方土戏的形成发展。

明代万历年间，昆曲流播入粤。博罗张萱（1588—1641），家蓄姬人黛玉轩，辗转市镇乡村演唱，能以《太和正音谱》唱曲，张萱为刻《北雅》一书；“天启二年（1622）宛陵（安徽宣城县）梨园以汤宾尹书至，乞以《北雅》唱昆腔。”明末，姑苏昆腔歌者张丽人，声艺超卓，倾倒当时广东士大夫，死后得到几百人送葬，并人为她建立百花冢的韵事，黎遂珠更撰《歌者张丽人墓志铭》：“丽人姓张氏，母吴倡也，以能歌转买入粤……张且二乔名，虽城市乡落，童叟男女，无不艳称之”。清初昆曲仍很兴盛，顺治年间耿继茂在广

州当靖南王，蓄戏班，养歌妓，奢侈无度。顺治十七年（1660）移镇福建，随行带走戏班十多个，大部是昆班。乾隆年间，昆曲在粤活动频繁。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）到广州外江梨园会馆上会的姑苏班，有十三班之多；不少徽班也唱昆曲，官班及富商巨贾家班，亦多唱昆曲。《荷廊笔记》载：“嘉庆季年，粤东商李氏家蓄维伶一部，延吴中曲师教之。舞态歌喉，极一时之选，工昆杂剧。”昆曲在粤盛行，为广东众多剧种所汲取或融合，对广东戏曲影响颇为深广。

广东戏曲的发展

明末清初，广东经历李自成、张献忠农民起义和满族入主中国，南明政权还历经弘光、隆武、绍武、永历、鲁王以及后来尚之信、耿精忠、吴三桂的反清活动，政局动荡不安，康熙为制驭东南沿海反清斗争，下令沿海居民后撤四、五十里，经济遭受破坏。康熙二十年（1681）“迁海案”结束后才渐趋好转。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描述康熙年间的广州“濠畔街当盛平时，香珠犀象如山，花鸟如海，番禺辐辏，日费数百万金。饮食之盛，歌舞之多，过于秦淮数倍”。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）清政府设立粤海关。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）后，清高宗只准广州一口通商，盛况更是空前。各省大商家云集，十三行改为十三洋行。有官商“三十六行”代市舶提举盘验纳税、包办对外贸易。各省会馆以及徽帮、湘帮、闽帮、山陕帮、赣帮、川帮、

浙帮等商贾丛积。1700—1750年，平均每年输入银子1308704两。商业资本流通，促使信用制度发展，银业公会忠信堂有会员34家，山西票庄在广州设有分店。经济发展，促进戏曲兴盛。各地演戏活动，更趋频繁。焦循《剧说》引《新齐谐》说：“乾隆年间，广东三水县前搭台演戏”。乾隆十九年刻本《佛山忠义乡志·艺文志》有《汾江竹枝词》：“梨园歌舞赛繁华，一带红船泊晚沙；但到年年天贶节，万人围住看琼花”。康熙二十六年至乾隆五十八年（1687—1793），海口先后建江张二公祠、福建会馆、高州会馆、兴潮会馆、西天庙、漳泉会馆、潮州会馆、五邑会馆。均有石戏台，除演土戏外，闽广客商多邀请家乡戏到琼演出。潮州“搭棚”演戏甚盛，有康熙陈琼作修堤完工演戏庆祝的写生画“演戏图”（现藏潮州博物馆），可见当时演出盛况。府、县城隍庙等。以及两浙、汀龙、嘉应、镇平等会馆，咸皆建有戏台，以备演戏。“坊乡以演戏多者相夸耀”，加之民俗祭祀节日不断，竟达“梨园婆娑，无日无之”，“举国喧阗，昼夜无间”的境地，韶州、惠州、雷州各府，咸皆如是。

清代广东戏曲的繁荣，表现为：

一、明代形成的剧种正字戏、潮州戏、白字戏，入清以后进一步得到发展并向外流播。

正字戏在明嘉靖“可瘵集本邑正音班”时，唱腔尚无昆曲。潮州于乾隆辛巳（1761）府志始见“唱昆腔”的记述。正音班在明末清初或吸取昆腔，或与昆班并合，剧目有所增加，唱腔得到发展。乾隆十三年（1748），陆丰碣石玄武山戏台扩建成两班合演戏台；乾隆卅五年（1769），正字戏双喜班组成，班名持续二百多年，除流布粤东、福建外，还远涉台湾演出。

顺治八年（1651），潮州有《新刊时兴泉潮雅调陈伯卿荔枝记大全》刊行，至此，潮人以乡音搬演戏文，先后有潮腔、潮调、泉潮雅调、潮州戏的称谓。潮州戏一词，首见屈大均《广东新语·诗语》：“潮人以土音唱南北曲者，曰潮州戏。潮音似闽，多有声而无字，有一字而演为二三字。其歌轻婉，闽广相半，中无字而独用声口相授，曹好之，以为新调者。”康、雍间蓝鹿州《潮州风俗考》述：“迎神赛会，一年且居其半；……伊伊呜呜，杂以丝竹管弦之和南音土风，声调迥异。”乾隆辛巳（1761）《潮州府志》载：“所演传奇，皆习南音而操土风，聚观者昼夜忘倦。”各地新建或修建的戏台甚多，如乾隆42年揭阳关帝庙前戏台扩建，澄海妈祖庙前新建戏台，并立碑以志。

康熙年间，潮州戏向外拓展，远至泰国演出。据英国布赛尔《东南亚的中国人》卷三《在暹罗的中国人》叙述：“1685年和1686年，法王路易十四的使节来到暹罗，大使楚蒙和两个随从楚

西长老和福屏伯爵都著有行记……。路易十四派到暹罗的使节受到盛筵招待。宴后有中国人演出戏剧（据楚蒙说是喜剧而楚西说是悲剧），演员有的来自广东，有的来自福建。”“约三年后，1687年和1688年正当纷乱的期间，罗培居于大城。他同样以令人娱乐的口吻记载戏剧演出……”泰国方面材料说这是潮剧在大城皇朝官庭演出。1767—1782年暹罗郑皇朝的郑王是潮州人，此后潮剧去暹罗的渐多。

海、陆丰的白字戏用海、陆丰方言为舞台语言，拖腔多“唉伊唉”，康熙以后，有较大的发展，“开灯戏”、“神诞戏”、“酬神戏”、“醮戏”等四季不断，海、陆丰“春歌社舞，迎神赛会，演戏谢神，皆其俗也。”

入清以来，粤东地区戏班，有“半夜反”情况。正音戏、白字戏和潮剧，向来过从甚密，且有师授关系，艺人可彼此流通。白字戏和潮剧戏班，上半夜使用正音，开演例戏《四出连》等，投官宦士绅之好；下半夜用方言演唱。正字戏亦如是，上半夜唱正音；下半夜为使平民百姓听懂戏文，改用方言演唱，称之为“大白字”。这种同班易语演出的现象，乡人俗称“半夜反”，沿用至建国前夕。

二、形成广州广腔、海南土戏、客家采茶戏和乐昌花鼓戏等本地声腔、剧种。

弋阳腔入粤后，杂用广州方言，逐渐地方化，形成广腔。吴人录

天先生著《粤游记程·土优》篇（该书有雍正十一年——1733年松陵人李元龙作序）述：“广州题扇桥，为梨园之藪，女优颇众，歌价倍于男优。桂林有独秀班，为元藩台所品题，以独秀峰得名。能昆腔苏白，与吴优相若。此外俱属广腔，一唱众和，蛮音杂陈。凡演一出，必闹锣鼓良久，再为登场。”同书还记载有昆腔与广腔混唱的现象，“榴月朔，署中演戏，为郁林土班，不广不昆，殊不耐听。探其曲本，止有白兔、西厢、十五贯，余俱不知是何故事也。内一优，乃吾苏之金阊也，来粤二十余年矣，犹能操吴音，颇动故乡之怆！”相传雍正年间“瘫手五”带来京腔，在佛山授徒并创建琼花会馆，其时京腔即弋腔。雍正七年修《罗定直隶州志》、乾隆初又修《新会县志》的王植说过：新会演戏很多，“锣鼓之声，无日不闻，街僻之巷，无地不有”；并且有“养戏之家”；“城外河下，日有戏船”，艺人乘船往四方演出。乾隆年间两任广东学官的李调元在《雨村剧话》（1784年刊行）中说：“弋腔始弋阳，即今高腔，所唱皆南曲，……粤俗谓之高腔，……”乾嘉年间，地处雷州半岛的海康县城，建筑固定石戏台，重金延聘俗称“名班戏”的广东大戏前来演出。道光三年（1823）正月，“有电白县人郭观陇带领戏班戏子逐日到各村演唱”（中山大学馆藏钞本《成案备录》卷二）。同治十一年刻《南海县志》记：“自道光末年，喜唱弋阳腔，谓之班本。其言鄙秽，其音侏离；几令人掩耳而走。而耆痴逐臭，无地无之。”用广州方

言杂唱的广腔，从弋阳腔衍化而来，其遗响在今天的粤剧大腔中可以寻得。顺德县流行的大棚戏，不仅台上帮腔，台下也帮腔，有《王十朋祭江》、《夜送寒衣》、《十五贯》、《苦凤莺怜》等剧目，除帮腔外，其唱腔与粤剧相仿。

乾隆以后，广东外江班云集，乱弹、梆子、西秦腔传入，广东粤语地区本地戏曲班社，先后汲收梆子和二黄等声腔。《梦华琐簿》说：“广东乐部分为二：曰外江班，曰本地班”，“大抵外江班近徽班，本地班近西班，其情形局面，判然迥殊”。“本地班但工技击，以人为戏。所演故事，类多不可究诘，言既无文，事尤不经”。《番禺县志》载锣鼓三“唱皆梆子腔”；《南海县志》说“所谓本地班者，院本以鏖战多者为最”，《荷廊笔记》谈清代广东梨园：“其由粤中曲师所教，多在郡邑乡落演剧者，谓之本地班。专工乱弹、秦腔及角抵之戏。脚色甚多，戏具服饰极炫丽。”本地班演出兴盛，城乡爆竹烟火不绝，以致屡屡失火伤人，从中亦可看到演出规模之大。道光十一年刻本《佛山忠义乡志》卷六载：乾隆二十二年，颜料行会馆演戏失火毙二十有二人；嘉庆二十四年新填地演戏失火毙二十有五人；道光六年，灵应祠神回庙戏棚失火毙六十余人。南海、番禺《县志》都记载道光廿五年广州学署前演戏失火，烧死一千四百余人。

海南土戏活动，见于乾隆二十年（1755）续修《琼山县志》：“正月下浣，乡民竞抬本境之神，以与邻村所祀者相会。刳羊击豕，